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戴书宏,肖永明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关键词] 钱大昕;古学;汉学;考据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4—0129—07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16.04.022

Qian Daxin and the Formation, Practice and Idea of the Ancient Learning Group

DAI Shu-hong, XIAO Yong-mi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value of the Han-Learning School was to count academic of Han Dynasty as a criterion. Together with relevant faith and technology system, it constituted the original paradigm of Qianjia textology. This paradigm generated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on Qian Daxin and Wang Mingsheng to concentrate on the study of textology. But the primary appellation was still the Ancient Learning, which evolved broad and narrow sens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t 1754 brought Wang Mingsheng, Qian Daxin and Ji Yun together, and then helped to bring about the Ancient Learning group. They immediately carried out numerous practices, and undertook the mission of compiling *Wu Li Tong Kao*. All the circumstances mean that the textology would transfer from the edge position to the center place, and replace Neo-Confucianism gradually, finally turn into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form.

Key words: Qian Daxin; the Ancient Learning; the Han-Learning School; Qianjia textology; paradigm

鉴于明末王学的泛滥无归,明清之际已有重“学”的倾向,入清以后,学术界更是以“博学于文”为鹄的。清人汪中总结清初的学术传统,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书》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①这一概括无疑是十分精当的,清代学术的脉络至此而明。而嘉定虽然偏居海滨,实则已经先行一步,其重“学”的风气早已广受儒林的称道。阎若璩曾谓“愿与同志感奋兴起,绍明古学,直追金华、嘉定诸先生之遗风。”^②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正是闻风而起

的后进之秀,其生长于嘉定,耳濡目染,自进学之初,便开始了“古学”的探索。

一 钱大昕的“古学”尝试与惠栋的引领之功

(一) 钱大昕早期的“古学”实践

晓征曾自述早年的学习经历,谓“当是时,举业家多不习诗,生徒或私作韵语,则父师相诟病,以为妨于制义也。府君独喜教不孝为诗,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又谓诗文非空疏无学者所能为,贷钱为不孝购书,恣其翻阅。”^③由此可知,

* [收稿日期] 2016-03-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思想史视野中的乾嘉学风”(CX2014B166)

[作者简介] 戴书宏(1988—),男,湖南炎陵人,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

① [清]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20页。

② [清]王鸣盛著,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十)·西庄始存稿》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9页。

③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五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75页。

举业和诗古文,乃是晓征早年最主要的功课。不过,在此之外,晓征也开始了对“古学”的探索。在晓征的“古学”尝试之中,屡屡为学者所道的,一为其在祖父的引导之下,逐渐产生了对小学的兴趣;一为其在授徒坞城顾氏时,遍读藏书,树立了“尚论千古”的志向。

晓征的祖父讳王炯,字青文,号陈人,正直好学,尤其尽心于小学的研究。晓征谓“(祖父)读书必先识字,故于四声清浊,辨别精审,不为方音所囿”。^①可见其对小学的重视,并且陈人公在音韵学上,还有独到的见解。晓征记到:

有客举王子安《滕王阁诗序》“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二句对属似乎不伦,先大父曰:“已矣”叠韵也;“丘墟”双声也。叠韵双声,自相为对。古人排偶之文,精严如此。^②

这一段轶事,屡次见诸晓征的笔端,可见其影响之大。漆永祥谓“大昕五岁时起即从钱王炯学,他后来在古声纽的研究上戛戛独造,超迈时人,从这里可见其渊源之所自”。^③其子钱东壁《显考竹汀府君行述》,更是以此作为晓征小学研究的起点,谓:

十岁,从先曾大父受业,即学为八股文。曾大父夙精小学,教以训诂、音韵,府君能贯通大意。曾大父又谓大父:“此子所造,必远过于我,虽入许、郑之室,无难也”。府君研究小学自此始。^④

小学之外,晓征还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第一次考据的实践。乾隆十年(1745),晓征十八岁,开始了教书授徒的生涯。《年谱》谓:

始授徒坞城顾氏。其家颇藏书,案头有《资治通鉴》及不全二十一史,晨夕披览,始有尚论千古之志。读东坡《戏作贾梁道》诗,辄援《晋书》以纠其失,中年见浙中新刊查注苏诗已先我言之。然居士年未弱冠,考据已有与前辈暗合者矣。^⑤

这次以史考诗的尝试,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乃是晓征在考据之路上的初试啼声。其中的具体细节,则见于晓征《十驾斋养新录》,书中谓:

东坡《戏作贾梁道诗》:“嵇绍似康为有子,郗超叛鉴是无孙。而今更恨贾梁道,不杀公闾杀子元。”予弱冠读《晋书》《宣帝纪》,即疑此诗之误。盖王凌为司马懿所杀,非司马师也。懿字仲达,师字子元,东坡误记此为司马师事耳。^⑥

多年之后,晓征对知识的细节依然记忆犹新,可见这一次实践的影响之大。在晓征的成学之路上,这次考据的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这次成功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在考据学上,晓征

已经登堂入室了。实际上,晓征的实践与前人零星的考据相比,并无二致,最多只能归结为个人的雅好。但其中却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即在性情和禀赋上,晓征乃是偏重于考据的。章学诚曾将学术的分殊归结到人的性情上,而考据和义理则分别对应于“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和“高明者由大略而切入”。^⑦由晓征所显现出的性情和禀赋来看,其无疑是为考据而生的“沉潜者”。则其对小学的兴趣,也应该作如是观,更多的是个人经历和性情的体现。钱东壁情见乎词的行述,无疑具有夸张的成分。钱穆曾谓“据竹汀年谱,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已在乾隆庚寅,竹汀年四十三,上距惠、戴扬州绵交亦十三年矣。则竹汀治声音、训诂之学,实闻惠、戴而起者……”^⑧晓征究心于文字训诂之学,断然不至于如此之晚,然而,惠、戴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与惠栋的相遇,预示着晓征的学术即将迎来质的飞跃。

(二)惠栋对钱大昕、王鸣盛的范式作用

传统上,乾嘉考据学以吴、皖分庭,而惠栋即是吴派的首领。并且惠栋的年事长于戴震,因而在乾嘉学风的形成之中,惠栋扮演的乃是奠基的角色。艾尔曼谓“准确地说,17世纪学者只是考据学的开拓者,因为他们排斥理学主张,倾向两汉学术思想,但还未显示出明显的‘汉学’特征。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直到18世纪苏州学者惠栋(1697—1758)之时才正式成型。”^⑨而晓征正是于乾隆十四年(1749)入读苏州紫阳书院,并在当年与惠栋订交,从此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晓征谓:

予弱冠时,谒先生于环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⑩

在学术史上,晓征与惠氏的交往虽然比不上惠、戴之交,但也是极其重要的,其标志着晓征的学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对晓征而言,如果说韩愈、欧阳修等古文家与黄淳耀等乡贤的影响还在于“破”的话,那么惠氏的影响则显然在于“立”了。正是在惠氏的指引之下,晓征才得以接触到考据学的信仰、价值与技术系统,即考据学的“范式”(详后)。惠氏四世治经,其父惠士奇曾谓: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

惠氏亦谓: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

①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五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68页。

②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

③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④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一)·钱竹汀先生行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页。

⑤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一)·钱辛楣先生年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页。

⑥ [清]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321—322页。

⑦ 见余英时著,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8页。

⑧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58页。

⑨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46页。

⑩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4页。

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①

此即考据学由经典训诂以求取圣人之道之“范式”。晓征在多年之后,犹以之为治学的宗旨,谓:

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②

可见这一“范式”对晓征的影响之大及其笃信之深。然而,此时的晓征年岁尚小,并且困于功名,虽然有志于经史,却不能全力以赴。因而,晓征虽然体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潜质,但却并无具体的学术成绩可言。而真正深受惠氏影响,并付诸实践的,当属晓征的同乡同学王鸣盛(1722—1797,号西庄)。晓征与西庄“总角交”、“幼同学”、“长同官”^③,且“西庄长予六岁而学成最早,予得闻其绪论,稍知古学之门径”^④。可见在晓征早年的学业之中,西庄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同人和助力。下文即借由西庄的学术实践,以明晰惠氏对于钱、王等后学的范式作用。

与晓征一样,西庄也是在紫阳书院就读时与惠氏订交的,并且其对惠氏的皈依更加彻底。江藩《汉学师承记》记录了惠栋对西庄的巨大影响,谓:

又与惠松崖征君讲经义,知诂训必以汉儒为宗。^⑤

西庄从此终身谨守汉学门户,并最终成为了惠氏阵营中的一员健将。西庄《十七史商榷自序》谓:

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佗徙。^⑥

西庄此语几乎与惠氏同出一口,可见其对惠氏的崇信。并且西庄还将其付诸实践,开始了《尚书后案》的撰述计划。

乾隆十年(1745),西庄跟从惠氏讲求经义,服膺《尚书》,便着手准备《尚书后案》的撰述工作。《尚书后案自序》谓“草创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其以“后案”为名,正是为了进一步坐实阎若璩、惠栋以来的研究,即所谓的“名曰‘后案’者,言最后所存之案也”。^⑦而其广泛搜罗文献、自注自疏的取径,也是直接承袭惠氏而来。钱穆谓“二书皆自注而自疏之,亦师定字周易述体例。二书动机,皆由知东晋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乃进而为汉人二十八篇原注之搜讨,其意向取径,正犹惠氏父子知宋后言易图不可信,乃进而为汉易

之搜讨也。”^⑧可见西庄的动机、体例和方法,无不深受惠氏的影响。事实上,西庄对此也有着真切的告白:

彼既为真,则此自为伪,自唐贞观以后,无一人识破,直至近时,太原阎先生若璩、吴郡惠先生栋,始著其说,实足解千古疑团。予小子得而述之,既作后案……^⑨

为学术群体所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广义的“范式”;而领袖人物的考据作品,则发挥着具体的示范作用,此即狭义的“范式”。^⑩惠栋对王鸣盛的影响,正在于广义和狭义的两面。钱大昕亦复如此,只不过尚无充分的条件,使其得以一展长才。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及第,恰好为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契机。乾隆十九年的进士考试,必定会在学术史上留下非凡的意义。这些人在京师的聚集,标志着考据学群体的形成,也预示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只不过当时尚无“考据学”之名,也鲜用“汉学”之目,而是笼统地称之为“古学”。

二 “古学”群体的形成及其学术实践

(一)“古学”群体的形成与钱大昕、王鸣盛的学术地位

乾隆十九年,晓征在经历数次乡试、会试之后,终于考取了进士。一同中榜的还有王鸣盛、纪晓岚、朱筠和王昶等人,众人都是百里挑一的饱学之士。一时风云际会,“得人之盛”无过此科。纪晓岚谓:

公与余同以乾隆甲戌登进士。是科最号得人,其间老师宿儒,以著述成家者不一;高才博学,以词章名世者不一;经济宏通,才猷隽异,以政事著能者不一;品酒斗茶,留连唱和,以风流相尚者亦不一。^⑪

纪氏以学者、文士、经济、游艺四分其人,事实上,就考据学的发展而言,以上诸人亦可两分,只不过一类为治学有成的巨匠,一类为倡导有功的推手。

王鸣盛与钱大昕,适足以代表前一种类型。在众人之中,他们无疑是最有成就的两员健将。西庄博学多才,贯通四部,成就斐然。其曾自比于明人王世贞,谓:

我于经有《尚书后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部,其庶几乎!^⑫

言辞之中不免自负,但却是实情。西庄的才学、成就,自然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比拟的。而晓征则更是超迈其上,经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45—346页。

②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1页。

③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38—841页。

④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6页。

⑤ [清]江藩撰,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45页。

⑥ [清]王鸣盛著,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十一)·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15—416页。

⑦ [清]王鸣盛著,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十一)·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13页。

⑧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47页。

⑨ [清]王鸣盛著,顾美华标校:《蛾术编》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63—64页。

⑩ 余英时《重寻胡适的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26页。

⑪ [清]纪晓岚著,孙致中等校点:《纪晓岚文集(一)》卷十六,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46页。

⑫ [清]王鸣盛著,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一)》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

史淹贵,一时无两,几乎与惠栋、戴震形成了鼎足而三的格局^①。至于纪晓岚、朱筠、王昶等人,自身的学术成就不高,更多的是以“中朝荐绅负重望者(章学诚语)”的身份,去倡导乾嘉学风,推动考据学的发展。尤其是纪晓岚和朱筠兄弟,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张维屏谓:

乾隆三十年代之后,使乾嘉考证学风迈向巅峰的因素有二:一是大兴朱氏兄弟(朱筠、朱珪)为主的一批考证学者,运用自己在官场任职的衙署为基地,号召同好共兴典籍校勘及文字训诂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二是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下诏修《四库全书》,位在翰林院内由纪昀主持的“四库全书馆”顿时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②

需要注意的是,众人在结识之初,自然不会有如此分明的区别,但是禀赋各异、才情不同,也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就当时而言,学术地位的高低还夹杂着仕途的显隐。西庄以第二人及第,并在之后的京察、大考中,屡屡占据高等头名,不数年而官至二品,进而有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之任。圣眷的优渥,足以羨煞旁人。并且,西庄年长于众人,而成学又最早。因而,在当时和之后的一段时期之内,西庄的地位都是无人能比的。时人论及当时的学者,往往首举西庄之名,即是此意。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谓:

以两人学问论,少年时,西庄比竹汀高出一筹。中年时,旗鼓相当。这个可以引西庄诗句作证。……这句话可以看出西庄把自己放在竹汀之上,口气很不小,但也反映了竹汀有并驾齐驱之势。到了晚年,情况更不同了。^③

诚如柴氏所言,西庄在当时确实高出晓征一头。但是晓征也已经锋芒初露,显现了过人的潜质。戴震曾谓:

钱辛楣《五礼通考》中说话,多有似是处。^④

戴震此语,看似评价不高,实则是对晓征的高度肯定。东原治学重在求“是”,而此处即以“是”许给晓征,可见后生的可畏。而凭借着出色的诗文和编撰能力,晓征在史馆之中,也赢得了“南钱北纪”的赞誉^⑤。当时的晓征,无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二)钱大昕的“古学”实践与《五礼通考》的编撰

进士及第之后,没有了举业的牵绊,晓征得以专心于“古学”的研究。其研究始于讲习算术,进而推明历法,考索史志,并旁及经学、金石等专门学问。事实上,晓征于会试中式的前一年,就已经开始了对推步之学的探索。《年谱》谓:

十八年癸酉,年二十六岁。在中书任暇,与吴杉亭、褚鹤侣两同年讲习算术。得宣城梅氏书读之,寝食几废。因读历代

史志,从容布算,得古今推步之理。^⑥

此时的晓征与褚寅亮等友人沉浸在算术之中,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而算术也成为了这一阶段的核心功课。经过两年的研习和撰述,晓征的《三统术衍》终于在乾隆二十年(1755)脱稿,其《自序》云:

比岁粗习算术,乃为疏通其大义,并著算例,厘为三卷,名之曰《三统术衍》。盖只就本方法论之,其法只密与疏,固不暇论及也。^⑦

这是晓征算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至于其热衷于算术的动机,除了自身的兴趣和专长之外,乃在于晓征认为算术是儒者必备的技能,即所谓的“宣尼有言:‘推十合一为士。’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⑧。并且算术是历法的基础,而对历代历法的熟悉程度,又直接影响着史志和经学的研读。因而,对笃志于学的晓征来说,算术不但不是小技,反而具有非凡的意义。在扎实的算术之上,晓征开始了历法和史志的研究。

除了直接与算术相关的历法和史志之学,晓征还将研习的范围扩展至经学和金石学等学问。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年谱》谓:

公事之暇,入琉璃厂书市,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晨夕校勘,证以史事,辄为跋尾。收藏金石文字自此始。^⑨

晓征后来以金石家著称,并且擅长以金石佐证史事,正是导源于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以“不通经义”自谦的晓征,开始了经学园地的耕耘。其耕耘直承惠栋,具体而言,则是由研读惠氏的《周易述》起脚,进而开展对《易》学和《书》学的探讨,并总结出惠氏治经的原则和方法。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晓征先后给王昶寄去两通信件,信中详述了近期的研究心得,其中首封谓:

松崖征君《周易述》推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尚书》逸古文虽亡,然马、郑诸家之传注,至唐犹存;今则惟存梅氏一家。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复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⑩

在治学方法上,晓征强调以经证经,正是沿袭惠氏的治经、解经之法。^⑪而所谓的“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则是惠氏“诂训必以汉儒为宗”的具体化。由惠氏所树立的“范式”的影响之大,可以想见。如果说在前一阶段,惠氏对晓征的影响还处在萌发之中,则此时无疑已经清晰而具体化了。而这些理念正是伴随着“古学”的实践而来

①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3—126页。

② 张维屏:《纪昀与乾嘉学术》,台北,台大出版委员会,1998年,第30页。

③ 见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顾吉辰主编《钱大昕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④ [清]段玉裁撰,杨应芹订补:《东原年谱订补》,[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六)》,合肥,黄山书局,1995年,第713页。

⑤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一)·钱辛楣先生年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⑥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一)·钱辛楣先生年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⑦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八)·三统术衍》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页。

⑧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77页。

⑨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一)·钱辛楣先生年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⑩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十)·潜研堂文集补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⑪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的,实践与理念之间的相辅相成,于此亦可见一斑。换言之,即确实的考据实践,不但使晓征取得了具体的学术成绩,还使之掌握了考据学的方法和理念。

与晓征的学思并进相同时,“古学”群体也迎来了一项重大的课题。是时礼部侍郎秦蕙田(1702—1764,号味经)为了修撰《五礼通考》,四处网罗人才,而诸人恰好都在秦氏的延聘之列,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相继参与其事。晓征乾隆十九年的《年谱》记载:

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①

晓征精于算术,其与秦氏的谈论,多半是围绕着天文、历算展开的。王昶则主要负责《时享》一类资料的辑佚。^②而王鸣盛担纲的是“军礼”一门的修撰,地位最为突出,其成果最终汇集为《周礼军赋说》四卷。^③在众人的合力之下,卷帙浩繁的《五礼通考》最终得以成书,《四库全书总目》谓:

是书因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一门。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礼之目,古经散亡,鲜能寻端竟委。乃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有五。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其他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非剽窃短订,挂一漏万者可比。^④

《五礼通考》,既是古代礼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考据学初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更是“古学”群体首次合作的结晶。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最主要的人物,都在其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可知就当时而言,《五礼通考》的编撰和完成,无疑是“古学”群体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成果。

在考据学的发展之中,乾隆十九年的进士考试,厥功甚伟。这一科不但促成了考据学者的聚集,还开启了考据学由边缘走向中央的进程。然而,当时尚无“考据学”之名,学者多是沿用前代“古学”的称谓。而所谓的“古学”,向来没有确定的含义,只是一种笼统的泛称。不过,随着考据实践的深入和惠栋汉学的成立,“古学”一词在概貌和涵括上,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三 以古为是:“古学”与汉学的合流

(一) 钱大昕对“古学”的“界定”及其分化

由于儒者普遍具有信古、尊古的信仰,“古学”一词一直便以褒义的面貌存在着。明清之际,学界厌弃了王学末流的空疏,笃学之士纷纷致力于“古学”的研究。在江南的中心城市之中,出现了“古学”复兴的趋势。^⑤不过,“古学”一词虽然常常为好学之士所称道,而其中的确切内涵却不得而

知。“古学”长期被模糊、笼统地使用着。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在著作之中,触及了“古学”的内涵,其中尤以钱谦益(1582—1664,号牧斋)的论述最具启发意义。

牧斋在一封信中,对危害“古学”的“俗学”进行了挾伐,其谓:

其间为古学之蠹者,有两端焉:曰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⑥

牧斋在此虽然没有对“古学”进行正面的界定,但却举出了“古学”的对立面:举业和道学等“俗学”。这种标举对立面的方式,无疑有益于探寻“古学”的意蕴。由此可以推出,所谓的“古学”便是区别于举业、道学等“俗学”的学问,此即“古学”的基本概貌。这种界定的方式,也为晓征所继承。并且其以“古学”为“俗学”对立面的意识,变得更加的明显和强烈。晓征于言行之中,常常以“古学”和“俗学”相对照,如其《赠邵治南序》谓:

今春天下贡士集礼部,主司思拔汲古不为俗学者,以救墨卷浮滥剿袭之失,而与桐褒然为举首。^⑦

又如《李南涧墓志铭》谓:

好博览古今,不为世俗之学,所至必交其贤豪长者。^⑧

晓征以“古学”救治“俗学”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而于其中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在晓征的眼中,“古学”正是区别于“俗学”的其他学问的合称。不过,在前人的绪论之外,晓征也不乏自出手眼之处。

鉴于科举之学的空疏之病,晓征曾对古文和时文进行了严格的分辨。在分辨之中,晓征认为求取古人的性情,才是古文创作的关键,而获取之法则是勤学善思。其谓:

唯读书谈道之士,以经史为菑畲,以义理为灌溉,胸次洒然,天机浩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后假于笔以传,多或千言,小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恒,其理不违圣贤之旨,词虽今犹古也。文之古,不古于袭古人之面目,而古于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微独貌为秦汉者,非古文;即貌为欧、曾,亦非古文也。^⑨

这段精彩的议论,同样适用于“古学”、“俗学”之辨,并且,只有在这一段文字的比照之下,晓征的“古学”观才能逐渐地显豁起来。此处的议论,实际上暗含着晓征对于“古学”的两个重要界定。其一指向“古学”的实质,即“古学”不在于模仿古代学问的形式,而在于追求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或所谓的“道”。其二则明确了求道的途径和方式,即博习经史,勤学善思。此即意味着晓征眼中的“古学”,已经偏离了传统上的“成德之学”,而倒向了“道问学”的一边。而“古学”原本即指举业、道学等“俗学”之外的一切学问,此处则进一步明确

①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一)·钱辛楣先生年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② 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③ 施建雄:《王鸣盛学术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④ [清]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9页。

⑤ 陈祖武:《江南中心城市与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⑥ [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七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01页。

⑦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75页。

⑧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83页。

⑨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3页。

了这一界定,即一切与经史等经验知识相关的学问,都可以被“古学”所涵括。换言之,即举凡名物训诂、六书九数、版本目录以及辑佚校勘等学术类别,都是“古学”的题中之意。

文人学士之所以对“古学”一词青睐有加,表面上是对举业、道学等“俗学”、“今学”的失望,实际上则源自于“古学”背后所蕴藏的“黄金古代”的信仰。传统的儒生普遍具有尊古的信念和复古的梦想,在其眼中,上古三代无论是在社会政治,还是在学术文化上,都是完美无缺的。晓征便曾动情地说:“而双声已昉于三百篇,吾于是知六经之道,大小奚备,后人詹詹之智,早不出圣贤范围之外也。”^①“古学”正是这种信仰和寄托的产物。而惠栋的汉学,无疑也具有同样的基础,其尊古、崇古的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汉学与“古学”之间,便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由前文的叙述可知,汉学具体的学术类别,都可以包含在“古学”的范畴之中。不过,汉学之为汉学,正在于其在“古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整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从而构成了新的学术“范式”。因而,在这一阶段汉学便成为了“古学”的具体形式,不妨称之为狭义的“古学”。与此相对,广义的“古学”即其原意,亦即“俗学”之外的一切学问的泛称。这种分殊也与时人的用语相符。其时,学者往往以“古学”指称汉学,并有兼含广、狭两义的法,如晓征《惠先生栋传》:

予常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已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②

此处的“古学”,既是广义的泛称,又是专门的汉学,乃是这一用法的显例。不过,从学术史着眼,广义的“古学”显然已经让位于狭义的“古学”,汉学俨然成为一时的学术风尚。

(二)以古为是:汉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合理性与不足之处

世人向来以吴、皖中分乾嘉学术,而惠栋成学又早于戴震,故而,惠派汉学自然成了考据学的开端。然而,惠、戴之间却是同中有异,汉学则更是“功罪参半”^③。汉学之功,在于惠氏力攻“古学”,开一代风气,树立了新的学术“范式”;而汉学之罪,也导源于此,盖其“范式”有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范式”(paradigm),借自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特指学术群体所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清代考据学的“范式”开创于顾炎武:

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这是实践顾氏“经学即理学”纲领的具体途径。^④而这个纲领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假定,即:

所谓“道”或圣贤之“理义”皆毕具于六经;但由于六经中之文字以及典章制度已非千载以下之人所能识解,故必须借径于训诂考证。换个说法,训诂考证是开启六经的钥匙,而六经则是蕴藏着圣人之“道”的唯一宝库。^⑤

此即考据学的“范式”,其中浓烈的“尊古重经”的倾向,是其核心的信仰和价值,名物训诂等方法则成为了主要的技术手段。而方法和信仰之间的联结,又构成了其中的另一个信仰和价值,即训诂考证乃是求“道”的不二法门,舍此之外别无其他。

不过,库恩的“范式”学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库恩将主要的关注都倾注在了理论上,而忽略了实验、工具等技术系统本身的价值追求。事实上,“存在着三种相互平行且很大程度上独立的研究:理论的、实验的和工具的。每一种研究对另两种都必不可少,但却又有其很大的自主性:它们都具有自己的生命。”^⑥考据学的研究亦复如此。名物训诂、六书九数等考据方法的本身,也有着与生俱来的价值追求。正如余英时所谓“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处处要尊重客观的‘证据’,对于一切古代文献都要‘考而后信’”。^⑦这种“考而后信”的精神,正是劳思光所谓的“客观训诂标准”的需要,并且劳氏还将“客观训诂标准”的建立视作乾嘉学风正式形成的标志。^⑧这种对客观标准的价值追求,正好对应着传统话语中的“实事求是”,而乾嘉学者念兹在兹的另一个核心价值,恰恰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价值与“尊古重经”的信仰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关系:对客观标准的追求,时时挑战着“黄金古代”的有效性;而非标准的建立,又直接受到信仰的规定。惠氏的汉学有功有过,正是根源于此。惠氏世守古学,而惠栋更是转进一层,竖起了“汉学”的大旗。惠栋的汉学,其实是对顾炎武的发展和深化,并使其抽象的纲领得以具体化。惠氏谓: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⑨

由此可知,出于对汉儒的信仰,惠氏已经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纲领,做出了具体的规范:在惠氏的眼中,所谓

①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3页。

②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05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第32—35页。

④ 以上皆见余英时《重寻胡适的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25页—227页。唯余英时将“paradigm”译作“典范”,而本文则遵从金吾伦、胡新和所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之为“范式”。

⑤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50—51页。

⑥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0页。

⑦ 余英时《重寻胡适的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27页。

⑧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下)》,台北:三民书局,2013年,第753页。

⑨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46页。

的“经学”,即应该是汉儒的经学,换言之,即汉代经师的学说乃是最高学术准则。梁启超曾谓:“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①此言最为精辟。然而,如果将其改成“以古为是,以汉为古”八字,则更是天衣无缝,惠派的精髓,一览无遗。

惠栋对汉代经学的崇信,造就了以汉人之是非为是非的观念,从而使汉学形成了“以古为是”的核心价值。但是这一价值却广受诟病,盲从和保守几乎成了汉学的标签。不过,即便如此,汉学在考据学中的地位也从未动摇过。这得益于其本身的合理之处。在“以古为是”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预设,即在古史的研究上,史料愈古则可信度愈高,有效性也愈强。而秦火之后,汉代的经典无疑是最古的了,甚至是仅有的,并且汉人传经极重家法和师承,因而,以汉人为宗主,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基于此,王鸣盛便主张谨守汉人家法,谓:

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佗徙。^②

不但是王鸣盛,就连戴震与钱大昕等人,在不少地方也表现出信古和盲从汉儒的倾向。^③但不同的是,戴、钱二人的尊汉是有限度的,因为汉学的“范式”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并非处处适用,其缺陷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自诞生之日起,“以古为是”的价值,就常常是高悬的理想,而难以落到实处。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汉儒经说,派别正繁,其两说绝对不相容者甚多,欲盲从其一,则不得不驳斥其他。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梁丘贺说,乃云‘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稽。《汉学商兑》卷下)然则所谓‘凡汉皆好’之旗帜,亦终见其不贯彻

而已”。^④梁氏所论,可谓知言。然而,实践之外,惠氏更大的缺陷还在于理论的自身。惠氏在实践之中,不得不另立准则,从而平息汉人内部的分歧。这便足以说明在多数情况下,“以古为是”的价值,并不能真正成为终极的裁判,在“古”与“汉”之上,还有另外标准的存在。这种是非的准则,自有其客观性和有效性,并不随着时空而改变。胡适《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一文,着重探讨了清代学者树立“通则”的能力。胡适举出钱大昕古音学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训诂学的典型案例,来说明他们通过归纳和演绎所得到的“通则”是科学的,颠扑不破的。^⑤清人的这种研究自然是汉儒难以企及的。并且,清人还可以依据可靠的“通则”来纠正汉儒的错误。由此,“以古为是”的价值便不攻自破了。

作为儒学在清代的最新形态,儒者“黄金古代”的信仰,自然也就成了考据学的核心信仰和价值。然而,在技术系统一面,考据学所采用的方法却是历史的,“实事求是”乃是其与生俱来的价值追求。二者的关系适足以用哲学上“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来形容。“实事求是”的要求,时时挑战着信古、尊古信仰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而“黄金古代”的信仰,又决定了“是”的底线和内涵。二者在动态之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而汉学“以古为是”的中心价值,恰恰就是二者平衡的结果,也是考据学最初的“范式”形态。在钱大昕、王鸣盛等人早期的成学之路上,这一“范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晓征等人而言,惠栋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渗入了观念、实践等方方面面。乃至“古学”一词,也出现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而其中的狭义即专指汉学而言。不过,就在考据学逐步走向深入的同时,汉学的有效性却在不断地递减,越来越多的研究不再为汉学的“范式”所容。并且,戴震与皖派开始崛起,这也意味着考据学的权杖,即将由惠栋交到戴震的手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第34页。

② [清]王鸣盛著,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十一)·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16页。

③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第35页。

⑤ 胡适著,李羨林主编《胡适全集(一)》,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63—390页。